

中国经济的“中等收入陷阱”之惑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有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征兆？

巴西和阿根廷沦陷“失落的二十年”前，与中国当前经济体质有何不同？

中国当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国富民强的社会主义新阶段？

……

徐高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这个最早由世界银行所创造的词汇，所描述的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过去经济快速增长所依赖的廉价劳动力等要素逐渐消失。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个国家需要找到其他增长的来源。

比较两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国家——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来看看中国所面临的风险有多大。我们看到，巴西和阿根廷的经济之所以在数十年间都处于停滞状态，是因为其增长曾数次被国际收支危机所打断。而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国内储蓄率太低、不足以支持其较高的投资率。由于储蓄率远超巴西和阿根廷，中国应当不会重蹈这两个南美国家的覆辙。而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到更广泛的国家样本中，可以发现其实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统计上并不明显，不宜把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都笼统归结到这个概念头上。

中国站在岔路口

如果中国未来几年步巴西阿根廷后尘，也落入陷阱，不仅高增长成镜花水月，连经济社会稳定都会面临重大挑战。

中国正站在一个关键岔路口：我们是会沿着东亚经济体所走过的“黄金增长路径”继续保持高增速，还是会像巴西和阿根廷那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几年就会见分晓。

如果继续走在东亚的黄金增长路径上，中国的高增长将还能维持十年以上。以购买力平价(PPP)、一种更能反映实际购买力的汇率计算，并除去价格因素，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及韩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收入水平相当。对那些东亚经济体来说，这个收入水平仅仅处在它们黄金增长期的前半段。因此，按照东亚的成功经验，中国的高增长至少还能维持十年。

但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似乎近在眼前。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在上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达到了中国目前这个收入水平，此后便陷入了经济增长低迷，收入水平停滞的局面，并在那种状态里一呆就是30多年。许多人认为，这两个南美国家已经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步巴西和阿根廷的后尘，也落入这个陷阱，不仅高增长将成镜花水月，经济社会的稳定也都会面临重大挑战。

东亚与南美 两大关键差异

投资率和净出口指向国内储蓄率。东亚经济体与巴西阿根廷更本质的区别，在于国内储蓄率。

巴西、阿根廷这两个国家究竟与日本韩国这些东亚经济体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它们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东亚经济体没有？

由此出发，我们对这两组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对比，找出了两个关键的差异——投资率和净出口。

首先从投资率进行分析。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并剔除价格因素之后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



翟超/制图

中国勿重蹈南美 “失落二十年”覆辙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规律，是人为结果，是坏政府和坏政策把充满发展潜力和资源优势的国家推向绝望的陷阱。曾把中国提升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模式需要调整和转型。

胡祖六

近来有许多关于中国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00美元至15000美元区间时，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减缓，经济发展失去动力，进入低增长的轨道。中国2011年人均GDP预计达5000美元，刚好入围所谓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经济成长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观察近两百余年经济史，欧美相继实现工业革命，从传统农业社会的低成长低收入状态，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最后转型成为了高收入的富裕社会。包括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等都走过了一个动态、复杂但连续的发展过程，并没有在所谓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停留。

如果真有所谓经济发展陷阱的话，那么“低收入陷阱”更加可能也更加可悲。自从错失西方工业革命，中国经历了近两百年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直线下降，曾是世界上最落后贫困的国家之一。现在，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持续大规模贫困问题，摆脱了低收入陷阱，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是否可以高枕无忧？

中国过去30余年高增长的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成就，来自于明智合理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政策。而今天中国经济中的深层矛盾宏观经济的失衡、金融体系的不透明和低效率、房地产的潜在泡沫、国有企业的继续垄断地位、政府过度的监管和干预、裙带关系和腐败的盛行、科技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能源与环境的空前压力等，意味着增长的可持续性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近年来日益高涨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给中国的未来增长蒙上了阴影。

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在某些方面确有步南美国家之后尘的迹象。南美国家资源丰富，曾为欧洲殖民地，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在20世纪初，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曾名列美洲第二，仅低于美国，高于加拿大。但在大萧条后，南美国家出现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严重伤害了经济的发展。进口替代、限制外资、不可持续的公共部门工资福利政策、腐败和收入严重不均，使南美经济和社会丧失了活力，其天然的发展优势无从发挥。到了20世纪80年代，南美国家政府债务高筑，陷入了严重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急剧贬值的恶性循环。南美经济曾陷入停滞，人均GDP增长缓慢，经历了“失落的二十年”。如果有“中等收入陷阱”的话，南美国家或可被视为最近似的案例。

但“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规律，而是人为结果。是坏政府和坏政策把充满发展潜力和资源优势的南美国家推向一个绝望的陷阱。而东亚四小龙的自由市场、开放与审慎财政与货币政策，使它们克服了土地狭小、人口拥挤和自然资源短缺等瓶颈，极大发挥了企业家的创业潜能，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使之快速而平稳地迈入富裕的高收入社会。

“中等收入陷阱”本不存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应该说为后续经济发展打下了更好的基础。东亚四小龙所走过的发展路径，可以成为中国未来增长的轨迹，我们不必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多虑。但是，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必定会面临新的挑战与风险，曾把中国提升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模式需要调整和转型。如果我们在一个韩国、我国台湾地区早在25年前就已实现的收入水平上开始盲目自大、不思进取、停止改革，让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绑架经济政策，那么中国有可能重蹈南美覆辙，不知不觉走入一个自设的陷阱。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之战略战术

胡鞍钢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

我国已经制定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十二五”规划，推动实现这一根本性的战略调整，是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核心，以保证中国避免一般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社会分化、社会冲突和社会震荡的“中等收入陷阱”。

“十二五”时期，我们首先要处理好的问题是：一方面继续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与世界各国一道，尽快地实现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同时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迅速实现旧的发展方式向科学发展方式的转

变，我们今天的一系列战术调整和具体工作，都要服从转型发展这一战略大局。

我国发展模式实现由“加快发展”——单纯追求速度，向“科学发展”转变至少需要花15年的时间。战术上说，它大体要分为三步走：“十一五”时期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十二五”时期基本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十三五”时期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

从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全面转型期。“十一五”时期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初步转变，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资源消耗、生态代价明显下降。这表现为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地区生产总值差距继续缩小，资源节约利用水平提高，环境污染排放减少，环境质量初步改善，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十二五”时期是纳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与攻坚时期。因此，中国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科学发展模式转型，“十二五”承担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能否利用全球经济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抓住全球格局调整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决定着中国能否在2020年全面实现科学发展。

为了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我们在战术上也必须大胆探索一些新的机制和办法。从世界大国来看，各国一般都不统计地区生产总值，更谈不上通过地区生产总值来比较、考核地区的政绩，这容易产生重复计算，它并不科学，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太大，目前统计省级生产总值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必要统计省以下地区生产总值，则值得进一步研究。从长远角度看，还

要与国际接轨，中国也要逐步取消对省级以下，乃至省级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只统计全国的GDP，不能搞出两套不同的GDP数据，否则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推行，不利于战略目标的推进。

对地方政府，取消了地区生产总值考核目标后，它们的政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地方政府最大的政绩就是改善民生，提供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和重要公共产品，加强社会管理，进行市场监督，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实行绿色发展，强化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从不同的政府层次看，从中国历代的政治经验看，越是较低一级的政府，越是基层政府，就越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越是淡化经济职能。这是地方政府能级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这是由科学发展观所决定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水平，从投资占经济的比重，即投资率，可以了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路径。是否能够保持稳定的高投资率，是东亚经济体与巴西阿根廷间的一个关键差异。与东亚经济体黄金增长路径相伴的，是它们稳定的高投资率。其中我国台湾地区投资率略低，但很稳定。可在巴西阿根廷，投资率不但较低，平均下来仅20%，而且很不稳定。阿根廷投资率高时可达到30%，低的时候仅10%多一点。由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投资率的大幅波动中，巴西阿根廷的收入水平也就相应波动，来回拉锯。

净出口是这两组国家的另一个关键差异。在人均GDP水平下，以购买力平价PPP并剔除价格因素，计算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比较下来，两组国家的差异明显。在其黄金增长路径上，东亚经济体一般保持了比较稳定的贸易顺差。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是个例外。这却是巴西和阿根廷所缺乏的。这两个南美国家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时，也是净出口大幅波动，经常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

投资率和净出口指向国内储蓄率。要发掘两大差别背后更本质的差异，我们从这两组国家投资率和净出口的相关关系入手。可以发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中，投资率与净出口之间正相关或无相关，这与巴西、阿根廷的情况截然不同。在这两个南美国家中，投资率与净出口明显负相关。换句话说，巴西阿根廷投资比较旺盛的时候，都是这些国家有大幅贸易逆差的时候。这显示，东亚经济体与巴西阿根廷更本质的差别，在于国内储蓄率。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一国的国内储蓄有两大用途：要么用做国内投资，要么借给外国

并形成贸易顺差。巴西阿根廷投资率与净出口负相关的事说明，这两个国家的国内储蓄率不够高。因此，每当投资比较多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贸易逆差的形式从国外借钱来为投资融资。外债借多了总是要还的。因此，经历一段时间的高投资率与贸易逆差之后，巴西和阿根廷就必须降低国内投资率，累积贸易顺差来偿还之前欠下的外债。而这一转换往往表现为破坏力巨大的国际收支危机，令之前快速增长的经济遭受重创。

高储蓄率构成安全垫

中国目前接近50%的国内储蓄率明显高于其他东亚经济体，就更别说巴西和阿根廷。大量的国内储蓄使中国不会像巴西阿根廷那样受国际收支危机的干扰。

了解巴西和阿根廷因何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相比东亚经济体，这两个南美国家缺乏稳定的高投资率、净出口也时常在顺差和逆差间大幅波动。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明显低于东亚水平的国内储蓄率。由于国内储蓄率不够，当巴西和阿根廷需要增加投资时，就需要通过贸易逆差的形式从国外大量借债来融资。而这两个国家的投资中流向生产性领域(如制造业)的偏少，消费性领域(如房地产等)偏多，因而并未增加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及赚取贸易顺差的能力。当外债借得多了，它们就不可避免陷入国际收支危机。经济危机对经济结构进行强行调整，令这两个国家的投资率大幅下滑到低于国内储蓄率的水平，产生出贸易顺差来还债。经济增长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陷入明显衰退。因此，准确地说，巴西阿根廷在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

是一系列国际收支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打击，反映的是这两个国家国内储蓄率不够的现实。

厘清了巴西阿根廷的教训，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中国不会重蹈这两个南美国家的覆辙。中国目前接近50%的国内储蓄率甚至明显高于其他东亚经济体，就更别说巴西和阿根廷了。大量的国内储蓄为国内的高投资，以及高投资带来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都不会像巴西阿根廷那样受到国际收支危机的干扰。

中等收入问题并非全是“中等收入陷阱”

找到足够的内外部需求，避免落入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陷阱，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中国不会重蹈巴西和阿根廷的覆辙，是否就一定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由此问题出发，我们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文献检索发现，自2007年世界银行创造出这个词以来，它就曾被当成一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重大风险而被常常提及。很多人也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药方来论述如何跨越这个陷阱。但是却很少有人问：“中等收入陷阱”真的存在吗？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就把它当成一个给定的事实。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东亚文艺复兴：经济增长的一些想法》(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的第17-18页。但在那里并未对这个概念深入分析和数量检验。随后的文献也往往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分析的起点，很少对其进行数量上的验证。事实

上，在跨国数据中很难找到“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我们用世界近70个主要经济体的历史数据，估算了收入水平与增长率的对应关系。在中等收入水平时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偏低。从经济体落入衰退的概率也能得到类似结论。从不同收入水平下经济体落入衰退(经济负增长)的概率这一指标看，中等收入水平也并不突出。事实上，在较高收入水平(接近2万美元)上，经济增长的平均表现似乎比中等收入时还略差一些。

从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国家，我们发现，其经济增长之所以长时间停滞不前，是因为它们国内储蓄率不足，因此持续遭受国际收支危机的冲击。这与这两个国家的收入水平的高低并没有太大关系。而其他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内的国家也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因此，不宜笼统地说它们是因为收入到了中等水平，经济增长就出了问题。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并不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经验事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确实面临着不少挑战。但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就各种风险因素的机制展开分析、找寻对策，不宜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都笼统地归结到“中等收入陷阱”头上。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掉以轻心，高储蓄率只意味着中国在供给方面有实现高增长的潜力。但这些潜力能否转化为现实，还需要看是否有足够的需求来让它们充分发挥出来。而中国作为一个消费过低、内需不足的失衡经济体，显然在这方面存在更大的问题。如何找到足够的需求(不管是来自于内部还是外部)，避免落入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陷阱，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作者系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